

KISSINGER'S SHADOW

THE LONG REACH OF AMERICA'S MOST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基辛格的影子

美国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及其遗产

[美] 格雷格·格兰丁◎著 符金宇◎译

新 华 出 版 社

KISSINGER'S SHADOW

THE LONG REACH OF AMERICA'S MOST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基辛格的影子

美国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及其遗产

[美] 格雷格·格兰丁◎著 符金字◎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辛格的影子/[美] 格雷格·格兰丁著; 符金宇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9

书名原文: Kissinger's Shadow: The Long Reach of America's Most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ISBN 978-7-5166-2827-0

I. ①基… II. ①格…②符… III. ①基辛格 (Kissinger, Henry Alfred) —人物研究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634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0446

KISSINGER'S SHADOW: The Long Reach of America's Most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by Greg Grandin Copyright © 2015 by Greg Grand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etropolitan Books,

a division of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New York.

简体中文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基辛格的影子

作 者: [美] 格雷格·格兰丁

译 者: 符金宇

出 版 人: 要力石

特约编辑: 赵 璐

责任编辑: 张 敬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彩丰文化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827-0

定 价: 5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译者序 //1

引子：看不见的魔鬼 //4

序言：提前写好的讣告 //8

第一章 宇宙的节奏//23

第二章 目的与手段//43

第三章 基辛格笑了//58

第四章 尼克松风格//80

第五章 反基辛格派//95

第六章 统一的对立//111

第七章 掩饰与演戏//132

第八章 难以置信//156

第九章 原因与结果//172

第十章 向海湾进军//184

第十一章 从黑暗走向光明//200

终章 少了基辛格的基辛格学派//216

译者序

基辛格这个名字，想必绝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年岁稍长的人都曾经听过。正是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与尼克松一道努力谋求改善中美关系，最终促成实现了中美邦交正常化。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中美外交史中最为人熟悉的经典回忆。然而，若非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政治学人士，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基辛格的了解似乎也仅限于此。换句话说，基辛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在美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在美国有多大影响力？对中国的影响又有几何？他在访华之前、访华之后，甚至说在访华期间，做过些什么？这一切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对中国人来说，“基辛格”这三个字似乎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代表着一段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每每提起，总会与尼克松联系起来，可一旦细细追问，却发现背后的一切竟又那样陌生。

那么，基辛格对美国的国民来说，又是怎样一番面目呢？这么多年以来，美国有关基辛格其人其事的书籍已经出版了不少。对于这样一位政治人物，争论非议自然难免。诚然，我并非美国人，在此不可能替他人乱下定论，可在细细品读《基辛格的影子》并且将之译出的过程中，我想我对于这位政治人物也多了几分了解，姑且算是又增长了一些见识吧。虽说，这样的见识更像是无聊，与他人高谈阔论天下大势时多出来的几分谈资，勉强可以拿出来在人前炫耀，聊以自得一番，但能有这样的收获，也算得上是干翻译这种单调寂寞的独活时的一点额外褒奖了。

当然，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的这本新著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这一点首先从作者的专业背景便可得到印证。格兰丁现为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著述颇丰，尤以历史叙述见长，2009年出版的《福特王国》（*Fordlandia*）一书入围了当年的“普利策历史类最佳图书奖”提名，并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图书”，其新著《必然的帝国》（*The Empire of Necessity*）则在2015年一举摘得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格兰丁身为联合国真相委员会的一员，早年曾对危地马拉进行实地走访，深入调查内战，于2000年和2004年先后写成《危地马拉的血》（*The Blood of Guatemala*）和《最后的殖民屠杀：冷战中的拉美》（*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 Latin America in the Cold War*），2006年又出版《帝国工厂》（*The Empire Workshop*），揭示了美国新帝国主义在拉美的兴起与影响。此外，格兰丁还为《纽约时报》《民族周刊》《洛杉矶时报》以及《新政治家周刊》等知名报刊执笔，纵论美国外交政策、冷战与拉美政治。

《基辛格的影子》正是出自这样一位学界权威之手。作者在书中充分展现出一位优秀历史学家在挖掘史实、分析史料方面的过人才华，对亨利·基辛格本人以及相关人士留下的语录著述，还有大量美国政府文件与解密档案进行了详细剖析，让我们看到了基辛格的真实面目，看到了这位尼克松时代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如何游走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让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实现；如何一步步走入白宫，重建“至高无上的总统权力”，改组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如何瞒天过海，避开国会，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穷兵黩武，滥杀无辜，通过武力复兴独一无二的“美国例外论”；又是如何在与新保守主义一派的官斗中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纵然早已挂印而去，却依旧对此后历任总统施加影响，留下了自己长长的影子。格兰丁在书中并未循前人旧迹，一味追究基辛格的功过得失，而是试图以一种新的视野来诠释这样一位外交家对美国今日外交之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难怪另一位历史学家本·柯尔南（Ben Kiernan）在读后会发出感慨，称赞“格兰丁的这本书在史料收集与研究上干得漂亮，不仅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分析缜密细致，旁征博引，取材广泛，足以改变人们的看法，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美国过去半个世纪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也正因为此，本书厚重的历史感与丰富的信息量让我这个译书之人在深感折服的同时也经受着不小的“折磨”。作者在书中采用的脚注与尾注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仅正文后的注释就多达40余页。这些注释不仅解释了作者自己的史料来源，也对书中提及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我在此已经尽可能地将其全部译出。此外，我在翻译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注释，对书中牵涉到的一些关键人名和其他背景知识做了一番相应解释，因为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与主人公基辛格有关的重要信息，目的只求让读者读得更加明白。

能够翻译本书，诚非我一人之功。首先，要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将这样一本好书托付于我。其次，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大学同事、美国外教托马斯·威廉·莫兰（Thomas William Moran IV）。翻译这样一本书，考验的不仅是语言能力，还有对美国国内事务与政治的了解。能够在这两点上得到汤姆先生的悉心解释与赐教，对我来说诚为幸事，和汤姆先生那些妙趣横生的对话也成为这段译事中的一大快乐。

最后，鉴于本人能力所限，书中纰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悉心指正。

符金宇

2016年6月于暨南大学

引子 看不见的魔鬼

托马斯·谢林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有一回问了亨利·基辛格这么一个问题：到底哪个更吓人，是看得见的魔鬼，还是看不见的魔鬼？

谢林问基辛格这个问题是在1970年5月初，也就是理查德·尼克松现身荧屏、发表电视讲话几天之后的事情。尼克松当时告诉全体国民，美国将向柬埔寨派遣地面部队，声称军事行动势在必行，必须肃清敌军在柬越边界一带的庇护所。不过，尼克松同样把话说得清清楚楚，他之所以决定派遣地面部队进攻一个中立国家，背后有些事情比军事战略要更加重要。“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总统这样说道，“我们看见有些人在不顾后果地向一切伟大的制度发起攻击。这些制度都是那些自由的文明国家在过去五百年里创造出来的。”尼克松话中有话，言下之意他之所以进攻柬埔寨，并非仅仅只是为了针对来自国外的威胁，还在于回应国内的动荡：“今晚经受考验的并非我们的权力，而是我们的意志与品格。”过去几个月以来，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一直在说已经订好方案，让美国从越南脱身。现在可好，二人竟然把战争一下子扩大到了越南的邻国。就在尼克松发表演说四天之后，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打死四人，都是抗议入侵柬埔寨的学生，另有九人受伤。两周之后，警方又在杰克逊州立大学朝一群抗议示威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开火，导致两人死亡，十二人受伤。

谢林对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思想理念上多少负有一定责任。此人头脑清晰，思维缜密，堪比计算机。谢林将自己在数学公式上的才华用到了军事战略之

上。他曾经说过：“不管你是打算‘震慑俄国人’，还是‘吓唬自家孩子’，问题其实是同一码事——你得在心里盘算清楚这样做到底是威胁，还是鼓励，得把握分寸，做到恰到好处。”林登·B. 约翰逊和手下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把谢林的理论直接拿过来就用，将轰炸北越当成了一种行为修正的方法。对那些将要从约翰逊与麦克纳马拉手中接过美国对越政策衣钵的人来说，谢林的影响同样巨大，对亨利·基辛格尤为如此。基辛格在加入尼克松的白宫班子之前曾在哈佛任教，视谢林为好友，故而也采纳了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尤其是谢林认为“一个人有多大能力讨价还价……取决于这个人有多大本事造成伤害”，造成“纯粹的痛苦与破坏”。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基辛格才打算在东南亚放手干。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1970年，谢林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反战人士。美国悍然入侵柬埔寨让谢林大为触动，于是连同其他十一位声名显赫的哈佛教授，风尘仆仆地赶往华盛顿，要同基辛格好好面谈一番，表达不满。这一帮反战知识分子可绝非泛泛之辈。过去多少年来，这帮人能够轻易游走于华府与剑桥^①之间，时而高居讲坛之上，时而现身作战会议室之中，身上贴着各式各样的标签，什么东部权势集团、天之骄子、当世智者、权力中坚……就是这样一帮人物。这支哈佛请愿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位日后的诺奖得主（谢林），还有多位物理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其中不少人曾经作为顾问，辅佐过数届总统，历史可以上溯至哈里·杜鲁门时代。请愿团中还有好几位甚至在美国介入越南的早期参与过政策执行。

这帮人说话当真，不开玩笑，一个个正儿八经地要和尼克松政府划清关系。“这样做太不像话了。”其中一位对记者说道，他指的就是入侵柬埔寨的事情。其他人则苦于越战让公众话语变得日渐恶俗粗暴，不胜其扰。“大学教授”也好，“开明派”也好，都是一路货色——尼克松的国防次长戴维·帕克德表了态，把请愿团就此遣散，打发回了老家。欧内斯特·梅身为请愿团成员之一，在哈佛大学当系主任，也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他对基辛格说：“你这样做，是要把这个国家从里面搞垮。”

^① 此处所指的“剑桥”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即哈佛大学所在地，下文同——译者注。

基辛格的这帮昔日大学同事此时并不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其实已经对柬埔寨和老挝秘密轰炸了一年有余（二人还将在今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继续炸下去，直到国会为这场空袭行动画上句号为止）。他们只知道美军打算入侵柬埔寨，仅此一点就已经足够糟糕的了。“真是有病”。谢林是这么说的。在美国，有这么一种论调，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鲜有质疑之声。不管你属于哪个党派，都认为华盛顿理所当然有权动用武力，对恐怖分子抑或潜在恐怖之徒的“藏身之地”发动打击，即便这些“藏身之地”就在某些主权国家境内，而这些国家并未与美国交战也无所谓。正是这种自负为小布什和奥巴马提供口实，打开了方便之门。前者在2002年出兵阿富汗，后者则在索马里、也门和巴基斯坦扩大了无人机攻击范围，不久前还对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武装行动。回到1970年，如此论调在当时可没有这样广阔的市场。基辛格试图加以辩解，声称入侵柬埔寨实属当务之急，剿灭共产党的“藏身之地”势在必行。基辛格的辩解遭到了以谢林为首的哈佛请愿团的严词驳斥。某位记者总结了请愿团提出的抗议，写道：“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主权，这个先例一开，世上其他任何国家就都能够效仿，为了比如说铲除恐怖分子，去侵略其他国家。”谢林后来对一位记者说道：“即使这样的侵略行为达到了本来目的，清除了敌人的藏身之地，仍然不能够以入侵他国作为代价，因为这样做终将得不偿失。”

哈佛请愿团与基辛格是在白宫地下室那间老旧的军情室里会面的。谢林首先对请愿团的成员一一作了介绍，表明来意，不想基辛格打断了他，插了一句：“各位我都认识……大家都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好朋友。”“你错了，”谢林说道，“我们这些人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我们已经对白宫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彻底失去了信任。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再听从你们的差遣，也不会再为你们提供建议。”谢林后来回忆道：“基辛格脸色变得灰白，一下子瘫倒在了椅子上。我当时猜想他一定感到非常失落。”有那么一会儿，基辛格问大家是否能够跟他说清楚，这届政府究竟犯了什么“过错”。正是在这个时候，谢林向基辛格问起了那个关于魔鬼的问题：“你往窗外外面看，看见有一个魔鬼，于是回过头来，告诉你身边的人，那个人就和你站在同一扇窗户边上。你对他说：‘看，

窗户外面有个魔鬼。’那个人也往窗外看，却根本没有看见魔鬼。请问你该如何向那个人解释，让对方相信窗户外面真的有个魔鬼？”

谢林接着说道：“在我们看来，会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第一种，也就是说总统在侵略柬埔寨的时候并不清楚他这样做是在侵犯另一个国家；要么就是第二种，总统其实心里明白得很。”

“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一种更加可怕。”

序言 提前写好的讣告

亨利·基辛格一直在为人诟病，指责他干过不少伤天害理的坏事。有朝一日倘若死了，批评人士又会找到机会把那些口诛笔伐重新再演一遍。克里斯托弗·希钦斯^①就把话说得很清楚，认为应该把这位前国务卿送上法庭，以战犯的罪名接受审判。诚然，希钦斯本人已经作古，可还有大把的人在等着看基辛格如何受审。这些人的名字足以列成一长串，有记者，有历史学家，还有律师，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等着拿出背后藏着掖着的那点儿东西，好让人看看基辛格在柬埔寨、老挝、越南、东帝汶、孟加拉、库尔德人的地盘、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塞浦路斯还有其他地方，到底干过多少坏事。

这么多年以来，关于基辛格其人其事出版的书不下数十本。可是，最为传记作家日后推崇的仍然只有西摩·赫什^②1983年写的那一本《权力的代价》（*The Price of Power*）。赫什在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孤芳自赏、耽于自我的偏执狂，为了出人头地往上爬，要么摆出一副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面孔，要么换上一脸阿谀奉承、逢迎讨好的媚相；要么捶胸顿足，抱怨时运不济，要么大手一挥，放任 B-52

①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1949—2011），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与新闻记者，因职业生涯长期在美国度过，后成为美国公民，是著名的宗教批评家、无神论者、反战人士，一生撰写、合著、编辑的著作超过三十部，代表作为2007年出版的《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译者注。

② 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1937—），美国记者与政治作家，《纽约客》杂志军事安全题材撰稿人，先后获得过两次“国家图书奖”，五次“波尔克奖”，1969年因首度披露越战期间美莱村惨案而声名鹊起，并于同年获“乔治·波尔克特别奖”，翌年获“普利策国际新闻奖”，2004年因在《纽约客》杂志披露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第二次获得“国家图书奖”，第五次获得“波尔克奖”，同时获得“乔治·奥威尔奖”——译者注。

轰炸机滥杀无辜。基辛格的形象就此定格。赫什笔下的基辛格纵然虚荣狭隘、目光短浅，却堪比莎翁，因为他的这些渺小举动被搬上的是世界的舞台，留下的影响深远而重大。

有人贬，就会有更多的人捧，毁誉声中总会找到平衡点。基辛格不乏众多倾心仰慕的支持者。诋毁的也好，吹捧的也好，只要把这些人统统去掉，那么给基辛格盖棺定论的任务就得留待那些一心找寻平衡的人士去完成。这些人会说，基辛格犯下的罪行究竟有多么深重，唯有与他留下的功绩两相权衡才能得出结论：是他缓和了美苏关系，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与莫斯科谈判签订裁军协定，还在中东地区展开穿梭外交。只有在这些节点上，基辛格制订的不少政策功过得失究竟如何，才会让人用“争议”二字去重新定义，留给各方去众说纷纭，而非用事实品评。看看刚愎自用的小布什有多么武断无谋，再看看固执己见的奥巴马又是怎样徒劳无功，只有看过这些之后你才会明白基辛格在处理政治问题上是何等老成持重、张弛有度。一如不少评论人士近来断言的那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基辛格式的治国理政之才。

人们的评价总是形形色色。总会有以前的同事和昔日的旧友站出来回忆，说起印象中基辛格这个人总是喜欢开古怪的玩笑，醉心权谋，耽于美食，对穿高跟鞋的女人尤其情有独钟。我们会记得这个人和吉尔·圣约翰还有马洛·托马斯约会过，还和雪莉·麦克莱恩谈过朋友^①，被亲切地称为“超级 K”“阿拉伯的亨利”“白宫花心大少”。基辛格才华横溢，脾气暴躁。他天性脆弱，故而沾染上种种恶习。至于他与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借用某位记者的话来说，可是“极其古怪”！这两个人天生亦敌亦友。基辛格可以当面拍尼克松的马屁，也会在背后破口大骂。“这个猪脑袋”，基辛格每回只要把电话挂掉就会这样称呼自己的那位顶头上司，“酒鬼

① 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 1940—）、马洛·托马斯（Marlo Thomas, 1937—）和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 1934—）都是美国著名的女演员。——译者注。

一个”。“尼克辛格”(“Nixonger”),以赛亚·伯林^①在称呼这一对搭档时就用了这么一个词。

基辛格1923年出生在德国的菲尔特,15岁那年来到美国。若是对基辛格的生平加以小结,来自异国他乡的背景总会引起外人关注。“犹太小子”,尼克松平日里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人们每每谈及基辛格的世界观,总认为他更加看重稳定与推动国家利益,将二者置于民主人权等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抽象概念之上优先考虑。可是,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自己的祖国天性良善,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国家,基辛格的世界观故而多被认为与美国人的自我意识有所冲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基辛格的传记作者沃尔特·伊萨克逊写道,“基辛格会在思想上保留他的欧洲本色。”另外一位作家^②则指出基辛格的世界观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不会具有的”。的确,随着年岁的增长,基辛格说话时带着的巴伐利亚口音也变得越来越重。

然而,倘若就此将基辛格视为外人另类,认为他与美国人的“例外论”琴瑟不合,难以协调,那么你根本无法准确把握基辛格的为人。基辛格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其思想特质完美契合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与时代。

青年时代的基辛格信奉的是最具美国特质的理念——自我创造。该理念认为人的命运并非由所处的客观条件所决定,厚重的历史沿袭也许会对自由造成束缚,可限制之内仍然留有相当的活动空间,足以让人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不过,基辛格并未以一种美国式的语调来阐述这些理念,要打个比方,比起沃尔特·惠特曼和赫尔曼·梅尔维尔这些成长于新世界的诗人与作家来,基辛格说起话来腔调显然有所不同。“过去已死,永不复生,”梅尔维尔是这样写的,“然而,未来就孕育在这

^①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与作家,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1909年6月6日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1年随父母移民英国,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包括古代历史、哲学在内的古典人文学科,“二战”期间曾在英国情报及外交机构任职,1946年重回牛津授课,后半生一直任教、居住在牛津。伯林早年受英国理想主义影响颇深,后来又接受康德哲学理念,其哲学思想兼合理想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一生著述等身——译者注。

^② 见罗伯特·达勒克(Robert Dallek)著《尼克松与基辛格:共掌大权》(*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样的生命之中，让我们活着甚至有所期许……那些只为过去支配的人终会如罗得之妻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此定格成回头张望的那一刹那……美国要做的是创造先例，而非遵循先例。”基辛格并未采用这样的笔调，他更喜欢用强有力的散文、用德国的形而上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理念。不过，二者在思想理念上大体是一致的。“必然，”基辛格在1950年写道，“描绘的是过去，而自由才是未来的主宰。”

这一句话出自基辛格当年提交的一篇论文，当时他还在哈佛大学读四年级。那篇论文洋洋洒洒一共写了四百来页，其中谈到了不少欧洲哲学大家的名篇著作^①。基辛格给自己的论文起了个题目，叫作“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文如其名，这篇论文读起来让人感觉内容琐碎、沉闷乏味，不少地方过于晦涩难懂，很容易被人当成初出茅庐小子的练笔习作，弃之一旁。然而，时至今日，基辛格已经通过种种形式，不止一次重申了自己当年在文中言及的假设与论断。不仅如此，这位论文作者早在初到哈佛之际，就已经对战争深有体会，对自己在文中提出的问题给予过广泛而现世的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包括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存在与虚无的联系，还牵涉到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究竟如何。

基辛格本人虽然在纳粹大屠杀中逃过一劫，却有12位家庭成员未能幸免于难。他在1943年应征入伍，回到老家德国度过了大战的最后一年，作为一名军事情报人员一步步向上升迁。克雷菲尔德是坐落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人口20万。盟军占领时，基辛格曾经担任过这座小城的行政长官，把纳粹分子从当地的市政管理部门给一个个清理了出去。基辛格同样展现出自己身为谍报人员的卓越才华，不仅把盖世太保的军官们逐一找出，逮捕起来加以审问，还对秘密线人进行妥善保护，

^① 基辛格的本科论文是在威廉·雅德尔·埃利奥特的指导下完成的。埃利奥特在外交史研究上采用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不过，基辛格早在就读哈佛之前，就已经对欧洲大陆哲学有了初步认识。他的启蒙老师名叫弗里茨·克莱默（Fritz Kraemer），普鲁士人，是一个反纳粹的保守派。基辛格与克莱默相遇相识还是在自己当步兵列兵、驻扎在路易斯安那州克莱伯恩兵营的时候。克莱默拿过好几个学位，其中有一个是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拿的。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Theodor Adorno）和其他一批社会学家创立了后人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眼光敏锐的读者从基辛格的著述中能够清楚看出他笔下的主题和论据多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克莱默或许便是个中缘由所在。“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基辛格2003年在克莱默的葬礼上说道，“是克莱默决定了我的视野与思想，影响了我在读大学时的选择，唤醒了我对政治哲学与历史的兴趣，为我的本科和研究生论文提供了灵感。”

凭借着出色的办事能力与无畏的胆识勇气，赢得了一枚铜星勋章。换句话说，基辛格本科论文中谈到的一个核心议题在于事实与真理的关系，这个议题对他本人而言并非什么抽象空洞的问题。正如某人在看过基辛格的论文之后所说的那样，这篇论文读起来感觉像是一篇“个人陈述”，都是些与生死有关的话题，而基辛格此后的外交策略，借用其在哈佛大学某同班同学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把他思想世界里的东西移植到了权力世界当中”。

从当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到 91 岁高龄出版的近著，基辛格的形而上学思想可谓在不断演变，半是“忧虑”，半是“喜悦”。这份“忧虑”体现在作者承认经验、即生命本身最终是无意义的，历史带着悲剧的色彩。“生命是一场磨难，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孕育着死亡，”基辛格在 1950 年写道，“世事无常、瞬息万变，这才是存在的宿命……经验总是独特而孤立的。”至于“历史”，基辛格说他相信历史具有某种“悲情元素”：“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与西伯利亚劳工营生活过的那一代人是无法做到像他们父辈那样，言谈之中带着同样乐观的语调的。”基辛格的“喜悦”源于他对于无意义的欣然接受，源于他意识到一个人的行动既非由历史必然预先设定，亦不受更高层次的道德权威主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是有“限度”的，这是“必然”。这种“必然”来自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他者无处不在。但是，个体既然拥有意志、本能与直觉，就能够利用这些特质来拓展自己的自由空间。

基辛格的本科论文充满了沉思苦想，要想从头到尾看完并非易事。然而，通读这样的文章却是值得的，因为这篇论文能让人看到基辛格脑子里装着的思想，看到这个人要比人们通常描绘的形象有趣得多。毫无疑问，基辛格往往被人视为“现实主义论者”。倘若将现实主义定义为对于人性持有悲观看法，相信必须仰仗权力对混乱的社会关系加以约束，维持秩序，那么这种说法倒也不假。可是，如果将现实主义视为某种对世界的认知观念，认为现实是看得透的，只需观察事实，便能得出事实背后隐藏的“真理”，那么基辛格显然绝对算不上现实主义的支持者。非但如此，对于那些今天遭到右翼贬斥的激进相对主义理论，基辛格却在本科论文中大声宣称自己是如何推崇：“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真理这回事。”在基辛格看来，除了人从自身孤立视角出发作出的推断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意义代表

着某种形而上学语境的显示，”基辛格写道，“每一个人都都在某种程度上，创造着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真理，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并不存在于事实之中，而在于我们面对事实提出的问题。历史的意义“从来都取决于我们面对历史提出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些带有强烈主观主义色彩的论调弥漫在战后的空气当中。基辛格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与让-保罗·萨特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后者关于存在主义的论述影响深远，其专著英文版在1947年付梓出版，也被基辛格列入了自己的论文参考书目之中。萨特和基辛格一样，也会很快用上“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这样的措辞。基辛格每每强调个人能够“选择”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他者时，说话的口气听上去绝对和萨特一模一样：既然道德这样的东西不是由外部强加产生的，而是源自内在，那么每一个个体“都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即便如此，基辛格还是会独辟蹊径，选择的道路与萨特以及其他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他的存在主义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换句话说，基辛格利用存在主义的目的不是反对战争，而是给发动战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在参与制订战后政策的知识分子当中，基辛格并非唯一一个高谈阔论人类存在带有“悲剧色彩”的，也不止他一人相信人生是一场磨难，人生在世的最好指望无非是建立一个有秩序、守规矩的世界。好比保守派的乔治·凯南^①，还有开明派的

① 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1904—2005)，美国外交家、政治学家及历史学家，1904年2月16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幼年丧母，自小与父亲继母隔阂，1925年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外交部工作，在日内瓦担任副领事，一年后调往德国汉堡，1929年进入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学习历史、政治、文化，并选修俄语，此后在多国担任外交公职，1944年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的副手。由于感到自己不受器重，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给国内发去了一封长达5500字的电报，阐述了自己的对苏外交政策，就此吸引了华盛顿的目光。翌年，凯南又以“X”为署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遏制战略”。该战略也成为美国对苏长期战略，乔治·凯南就此赢得“遏制之父”的称号。凯南一生主张政治现实主义，结束职业外交生涯之后重回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先后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与“国家图书奖”。2005年3月17日，凯南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译者注。